

学术史丛书



*THE US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18TH CENTURY  
IN WEST EUROPE*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  
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严建强 著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学术史丛书 / 范景中主编

# 18 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 传播及其反应

严建强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本书系 1999-200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本书由浙江大学侨福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 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 严建强著.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1

(学术史丛书 / 范景中主编)

ISBN 7-81083-002-3

I. 1... II. 严...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国、  
西方国家-清代 IV. K249.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0975 号

学术史丛书/范景中主编

### 18 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

著 者: 严建强

责任编辑: 陈 平/封面设计: 成朝晖

责任校对: 石同兴/责任监制: 葛炜光

出版发行: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杭州市南山路 218 号/邮编: 31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字数: 300 千 图数: 39 幅

ISBN 7-81083-002-3/J · 3

定 价: 25.00 元

# 目 录

## 绪 论 1

## 上 编：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 18 世纪西欧“中国热” 15

### 第一章 中国图像的变迁：从古典时代到新航路开辟 17

- 一、丝绸之路与古典欧洲的中国图像
- 二、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图像

### 第二章 大航海以来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报道 43

- 一、欧洲对华贸易与中国物质文化西传
- 二、17 世纪前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中国报道
- 三、17、18 世纪来自商人和使节的中国报道

### 第三章 传教士入华与西方汉学的兴起 70

- 一、适应政策与“中国礼仪之争”
- 二、法国传教士入华前的汉学研究
- 三、法国传教士入华后的汉学研究与翻译

### 第四章 18 世纪欧洲的“中国风物热” 97

- 一、“中国风”与“罗可可”
- 二、中国物品与欧洲的装饰艺术

## 绪论

### —

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我们审视 17、18 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往提供了新的视角。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多元文化碰撞和互渗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意识，使得该研究领域备受关注，它所包含的两个方向“‘中国热’中的欧洲”和“欧洲在中国”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sup>1</sup>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本书所关注的前一方向似乎更多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尤其是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活跃的学术表现，出版专著的数量为此后三十年间著述总数的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低谷，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1. 詹嘉玲[Catherine Jami]在《法国对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中用艾田蒲的《中国热中的欧洲》和詹嘉玲、德罗绘的《欧洲在中国》两部近作指代这两个不同方向的研究，类似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该文载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

开始才出现复苏的迹象,著述数量逐渐增加。从 1974 年开始,在法国尚蒂伊多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disciplinaire de Chantilly]每三年召开一次有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中国问题专家参加的国际汉学讨论会,

“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是会议的基本议题之一,例如前几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到“17-18 世纪中国同欧洲(主要是同法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中国对它们的影响”,包括“哲学影响”、“来自中国的艺术和科学”和“礼仪之争”等方面。<sup>1</sup>其他类似的国际会议也时有举行。

进入 90 年代,该领域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在欧洲和美国有一批重要的著作问世,所涉及的内容无论在专题分析方面,还是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都有重要的突破。<sup>2</sup>更具有意义的是,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中国学者开始改变原先主要局限于“西学东渐”研究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学西被”的领域。我们知道,在中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或“中学西被”这一方向的课题很少有人问津,与

---

1. 尚蒂伊会议论文中的重要文章由耿昇翻译编辑出版,书名为《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

2.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的主要著作有希雷恩的《中国与 18 世纪的欧洲园林》(1990)、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1990)、托马斯·李主编的《中国与欧洲:16-18 世纪的形象和影响》(1991)、劳端纳的《16-18 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亚洲》(1991)、泰家懿与奥克斯托比合编的《启蒙道德:莱布尼茨与沃尔夫论中国》(1992)和《发现中国:启蒙时代欧洲对中国的理解》(1992)、劳端纳的《亚洲在欧洲成长中的作用》(1993)、拉赫和凡克利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1993)、道恩的《中国情趣》(1993)、库克的《莱布尼茨论中国》(1994)、孟德卫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与意义》(1994)、杜木兰的《中国植物于 18 世纪引进法国及其风土驯化》(1994)、马克·克雷邦的《西方哲学明鉴中反映出的东方》(1994)、史景迁的《西方观念中的中国》(1998)等。

“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无论参加的人数,还是研究的成果都要少得多。例如,在关于欧洲社会的“中国热”以及18世纪欧洲盛行的“中国风”,西方已经出版了四五种名为《中国风》[*Chinoiserie*]的著作,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艺术风格对18世纪欧洲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在中国,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有过一部这方面的专著。这种状况不仅与西方汉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不成比例,而且也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欧洲乃至世界的贡献不相称。造成这种现象也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该方向的研究,无论文献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主要集中在西方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言包括拉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而且非常分散。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早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多为在欧洲的留学人员,如范存忠、陈受颐、李肇义、陈铨、钱钟书等,文章大多用外文写成。随着70年代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到博物馆观看实物,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同时,随着开放意识的加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视,社会公众和学者对文化间交流的重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些都给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学西渐”或“中国文化对欧洲之影响”的研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十年间所出版的著作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和还要多<sup>1</sup>,

---

1. 仅中国大陆出版的与该方向有关的著作就有钱森林的《中国文学在法国》(1990)、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1991)、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1991)、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91)、忻剑飞的《世界的中国观》(1991)、张弘的《中国文

同时有关论文的数量猛增，并出现了多种专门性的刊物。<sup>1</sup>

中国学者进入该研究领域的意义表现在：不仅可以通过提供新的维度和视角使研究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而且有助于克服西方学者研究中容易产生的盲点，尤其是纠正在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滋长起来的某些极端观点。虽然西方汉学界的辛勤耕耘使我们对欧洲形成中的作用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例如尚蒂伊第一次会议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sup>1</sup>，并且近年来也出现了多卷本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那样的著作，但我们也要看到，自近代以来逐渐滋长起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对一些人的思想发生着影响。随着欧洲国际社会重要性的增长和强势地位的确立，这些人越来越不情愿承认欧洲历史进程中的外来影响，而强调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寻找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渊源。对这一时期中国乃至东方的影

---

学在英国》（1992）、安文铸等编撰的《莱布尼茨与中国》（1993）、许明龙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1993）、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1993）、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999）、陈玮、王捷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1999）、许明龙的《欧洲 18 世纪“中国热”》（1999）、王宁等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1999）、周宁的《2000 年西方看中国》（1999）和史丹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1999）等，其数量比此前所有著述的总量还要多。同时，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也于 1999 年再度重版。

1. 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关于西方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杂志，主要包括《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中西交流论谭》、《中西初识》等，其他如《基督教文化评论》、《宗教研究》等也常发表有关的文章。



响，他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只是偶尔提及。这种不尊重历史的做法，使人们难以探明欧洲某些思想文化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比如，长期以来，欧洲学者们对欧洲 18 世纪自然主义园林运动和罗可可风格形成中的东方影响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但相对晚近的一些学者却认为承认东方影响是一件有失脸面的事，他们矢口否认这些文化现象中的东方因素。也有人直接否定 18 世纪欧洲思想家曾经对中国发生兴趣，拒不承认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sup>2</sup>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地辨析西方思想文化中的东方影响和东方因素，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估，不只是单纯的学术判断，也是一项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国学者参加该领域的研究，对我们更客观、更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化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推动。

## 二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交往的具体史实以及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的影响已有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史专家做了认真的考订、辨析与评估，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在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时都习惯于将欧洲（主要是西欧）视为一个统一的单元。这固然有

---

1. 米歇尔·德韦兹：《18 世纪中国文明对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影响》，载《法国研究》，1985 年第 2 期，第 80 页。

2. 参见莫里斯·罗宾[Maurice Robin]：《近代欧洲的“中国神话”》，载耿龙明、何寅《中国文化与世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11 页。

利于从整体上揭示欧洲对西传的中国文化的反应，发现其共同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看问题的方式也容易使研究流于一般。事实上，18 世纪的欧洲并不具有许多人所设想的同质性，相反，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着重大的差别，并使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要更明确、更具体地阐明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欧洲各国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从这些国家的不同国情特征出发，分别说明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或中国文化对它们产生的影响。这种视角的转换正是本课题研究的一种尝试。

本书主要叙述 17、18 世纪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在西欧引起的各种社会反应，并比较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利用方式，分析产生差异的社会原因，以此阐明外来文化引进、借鉴与本社会性质及需求之间的关系。本书在结构上相应分为叙述与分析两个部分。

本书上编是叙述性的。在作出中国与欧洲早期交往的简要的回顾后（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航路开辟后中国文化通过欧洲对华贸易，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的报道（第二章）和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的著作和翻译等渠道在欧洲的传播（第三章），以及由此引发的席卷欧洲的“中国热”，包括在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方面出现的“中国风物热” [*Chinoiserie*]（第四章）以及在思想和制度领域，中国文化通过对启蒙运动的渗入参与了欧洲社会改造的进程（第五章）。

不过，本书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的反应及产生的影响，而是中国文化在欧洲各国引起的不同反应，以及产生的不同影响。也就是说，本书所强调的不是欧洲各国对中国文化反应及利用方式上的一致性，而是其间的差异性。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欧洲各不同国家对中国文化所持的态

度，以及由此所规定的利用方式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原因何在？为此，本书下编通过对上述三个国家的分析和比较来回答这些问题。关于这三个国家的“中国热”表现的差异性，我们选择了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宫廷与决策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知识界围绕中国文化展开的讨论；以及“中国热”的进程与退潮。我们的比较研究表明：第一，和英国、德国相比，法国的宫廷和决策层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这不仅因为法国宫廷对来自中国的物品具有较大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路易十四以来历任国王周围一批对国家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家大都对中国文化饶有兴趣，并明确地表达了了解中国、以中国为榜样的愿望。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关注还表现在它亲自介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并与他们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第二，法国知识界也表现出对中国文化更强烈的关注。从人数和著述方面看，自 17 世纪末以来，在法国有远比英国和德国多的学者投入有关中国文化的讨论，许多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家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或著作；在涉及讨论的范围和程度方面，法国也远非英、德能及，无论在宗教、哲学，还是在政体、法律以及经济制度与政策方面，法国学者都广泛参与，成为讨论的主要力量。法国学者，尤其是启蒙学者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在其他两个国家所看不到的；法国学者所展开的这种讨论步步深入，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和连续性，也与英、德的间断的和个体的特征形成对比；第三，就“中国热”的退潮而言，三国并不是同步的。在英国，表现出思想文化层面与日常生活层面的明显分离，其知识界的中国热情主要表现在 17 世纪下半叶，从 18 世纪一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已经成为主流，所以并不存在 18 世纪末“中国热”的骤然退潮。在德国，思想文化界“中国热”延续的时间很长，时断时续。17

世纪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 – 1716]是欧洲哲学家中较早对中国发生兴趣的, 而另一位大学者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却是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 我们很难找到“中国热”在德国退潮的明确界线; 而在法国, 虽然有孟德斯鸠[Charles Secondat de Montesquieu, 1689 – 1755]这一类对中国文化提出批评的人, 但总体而言, 18 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可谓一片称颂, 欧洲的“中国热”在这里达到了最高潮。这种高涨的热情从 18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下滑, 到 18 世纪末整个社会表现出“从仰慕到排斥”的骤然转变。(第六章)

那末, 导致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何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利用方式与该社会的性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社会的性质不同, 所欲解决的问题不同, 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和利用方式也就不同。所以, 要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立足于首先阐明这一时期上述三国的社会性质, 以及它们在社会改造中所处的环境。通过历史的回溯我们发现, 到 18 世纪, 英、法、德三国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就英国而言, 由于议会政治和工厂制度的出现, 尤其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 已经跨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 成为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 德国依然四分五裂, 处在以邦君政治和地方主义为特色的封建状态, 统一的政权和国土尚待时日, 农奴制经济还占有重要地位; 而在法国, 随着封建主义退出历史舞台, 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皇权建立起来, 但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民族利益, 不如说是家族利益, 所以从本质上讲, 它不属于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 而属于“家产制”范畴的“王朝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还有一定数量的农奴, 但占统治地位的无疑是租

佃制农业经济，同时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力量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18世纪的法国正处在向近代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过程之中。我们认为，正是三个国家不同的社会性质导致了它们对中国文化在态度和利用方式方面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回答造成上述差异性的社会原因，并阐述了三个国家在中国文化利用方面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发现，18世纪三个国家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国情特色及社会改造的要求。走出封建时代的法国是一个政治上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色、经济上以租佃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当时的中国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没有达到中国的成熟程度。正是这种既相似又有差别的情况，导致了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热情，也导致了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利用；18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特点，所以像法国那样在政治上学习中国的开明君主，在经济上学习中国重视农业的现象并没有在英国出现。处于贸易扩张时代的英国有意识地将对中国的研究与寻求更广大的市场联系起来。然而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英国在行政官员的选拔方面还保留着传统的方式，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官考试制度相比显得落后，所以在这方面它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学习中国的经验；18世纪的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分裂的状况，政治上的分裂带来了地域的和社会阶层间的封闭和隔绝，被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对政治表现出极度的淡漠，却热衷于在精神文化领域耕耘收获，由此造成了德国在中国文化利用方面既不同于英国的经济和市

场的取向，也不同于法国的政治取向，而是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第七章）

由于“中国热”在法国有着最典型、最充分的表现，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欧洲这一时期“中国热”的中心，所以我们在最后一章（第八章）里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法国，通过对法国社会“中国热”的分析，阐明外来文化利用与本土社会性质、国情和所欲解决的问题之间的关联。我们首先探讨了法国知识界围绕中国文化展开剧烈争论的社会原因，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 18 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政治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该时期法国社会处于过渡阶段的表现。对中国文化不同评价的实质是各种不同政治改革方案间较量的一种表现。接着，我们就法国与英国知识界对中国农业政策的不同评价进行比较，通过这一比较具体说明社会改革理想与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与评价的关系。最后，通过对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变化性质的分析揭示法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由羡慕到排斥转变的社会原因：18 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随着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现实发展而消失，一方面，法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和阶级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了法国社会动荡不安，杜尔哥改革失败意味着 18 世纪上半叶在多种政治势力间达成的相对一致的共识——开明君主制——的破产。当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革命提上议事日程时，中国的经验不复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人们纷纷抛弃未来社会改造的“中国模式”，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迅速由仰慕走向排斥，“中国热”也随之退潮。

## 三

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对本书的书名作一个必要的解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书名中无论是限定时间的概念，还是限定空间的概念，都与所述内容不完全相符。当代出版物的名称必须简洁明了，琅琅上口，所以我们不可能像 18 世纪的前辈那样在书封面上随心所欲地写上一个长达几十、甚至上百字的书名，以便清晰地表明主题。尽管本书名已颇有冗长之嫌，但构成书名的两个主要概念由于无法进行更翔实的界定，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尽准确。

关于“18 世纪”。本书叙述和分析新航路开辟后由东西方贸易和基督教入华传教所造成的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其在西欧掀起“中国热”。这一由中国文化传入引起的社会反应事实上从 17 世纪业已开始，终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并不严格局限在 18 世纪。由于它最集中最典型的反应是在 18 世纪出现的，所以我们这里所使用的“18 世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象征性的含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界定。从这种意义上讲，

“18 世纪”是一个特别动人心魄的时代。中国和西欧这两个不同类型的高级文明首次实现了大规模的直接接触，它们的交往对各自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在人类历史上是鲜见的，因而特别值得我们回顾，这正是我们选择“18 世纪”作为讨论主题的原因之一。选择“18 世纪”的另一个原因与我们对文化交往基本理论的理解有关。正如我们在书中力图表达的那样，一个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利用方式不仅取决于异域文化的特性，同时也取决于本土社会的性质、特征及所欲解决的问题。这意味着，探讨中国文化对

18 世纪西欧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该时期西欧社会本身的特征有关。“18 世纪”提供给我们观察社会性质对外来文化利用进行制约的一个绝佳的机会：西欧三国不同的社会性质和社会改造的任务势必会影响到它们对西传的中国文化的态度及其利用。

另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是“西欧”。按现代地理学来理解，德国属于中欧的范围。然而，至少在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遵循着利奥波特·兰克[Leopold Ranke]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以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依据的区域划分，将欧洲分为东西两大部分。1824 年兰克在《拉丁和日耳曼国家的统一史纲》一书中将欧洲大陆东部的斯拉夫人排除在他所讨论的范畴之外，他写道：“这部分不属于我们的国家统一体，他们的习俗和制度与我们的不同。”<sup>1</sup> 这一说法在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 - 1831]那里得到回应。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Marc Bloch]在其经济史的研究中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他解释说，“东部斯拉夫人的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归入其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不可能把他们的经济状况与它们西部的邻邦相提并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发展轨迹绝不允许类似的混淆：就像 19 世纪经济史中将欧洲和欧化的国家与中国和波斯混为一谈一样。”<sup>2</sup> 本书所使用的“西欧”概念，其范围与上述的理解相似。当然，我们并不真正关注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区域划分，只是借助这一用法得以将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历史文化具有密切亲缘关系

---

1. 参见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4 页。

2. 转引自佩里·安德森前引书，第 4-5 页。



的国家置入同一的地理单元，使讨论不至于因现代地理学概念的理解而复杂化，或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按照这一理解，西欧的范围远较现代地理学的界定要大，包括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许多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卷入 17、18 世纪由中国文化西传引发的“中国热”中。从时间上讲，新航路开辟后首先进行对华贸易，并向欧洲报导中国的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耶稣会士入华传教从事汉学研究，并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先行者则是意大利人，法国派出传教士相对较晚，英国这个新教国家则不曾参加到这一远征中。然而，就西欧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或中国文化对西欧各国的影响程度而言，最热烈、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是上述的三个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尽管是最早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却不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热”；荷兰与意大利是“中国热”较早兴起的国家，但知识界围绕中国文化展开的讨论是很有限的；其他一些国家，如瑞典等，“中国热”主要表现在中国物品的流行和王室及上流社会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方面。所有这些国家“中国热”的程度都远不如上述三国。正因为如此，目前与该课题有关的著述都将主要的叙述范围集中在这三个国家。由于本书不是单纯地叙述欧洲“中国热”，而是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文化对西欧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并着重分析与解释造成这种区别的社会原因，所以为了使我们的比较研究更具典型性和说服力，本书把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英、法、德三国。

最后，我在此对那些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重要帮助的人们表达深深的谢意。首先感谢黄时鉴教授，他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自始至终关注和指导我的研究，不仅在本书的结构和主题的表达方面给了我大量重要的建议，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文献